

悬案：

墨子的国籍问题——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甚至有人推断他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

何为士？

在周代（西周，东周）以及春秋战国，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等；

在秦汉以后，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等。

秦汉以前的社会阶层或等级序列：贵族（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奴隶；

秦汉以后的社会阶层或等级序列：贵族，平民（分为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奴隶；

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

士的分类：

家臣：帮助大夫去管理家事；

文士：帮助诸侯大夫做文字工作（上层的文士做智囊，下层的文士做文秘）；

武士：帮助诸侯大夫做武装工作（上层的做将领，下层的做保镖或刺客）；

游士：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贵族，有适合的事情就去做，没有就闲着，文的叫儒，武的叫侠。谋士：帮助大夫诸侯出谋划策；

策士：帮助诸侯大夫做外交工作；

食客：啥呀干不了的，陪着诸侯大夫聊天、做游戏；

方式或术士：帮助大夫诸侯看病的、找药的、算命的；

总而言之，士的特点是：忙时帮忙，战时帮凶，外交帮腔，没事帮闲。

范文澜说：

孔子和墨子代表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

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

但是易中天不这样认为，他以为孔墨都是士人，代表不同的士；孔子是上层士的代表，墨子是下层士的代表。

易中天说：

孔子成名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是有音乐伴奏，开春了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

墨子成名后：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

孔子同时是艺术家；

墨子同时是工程师。

孔子和墨子的不同：

一、时代不同：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

二、立场不同：孔子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墨子的立场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们的；

三、代表不同的士：

1、孔子和墨子都代表士，但是孔子代表士的高层有贵族气；墨子代表士的下层，有平民味。

2、代表士的不同群体，孔子代表文士，墨子代表武士。

3、孔子代表游士中的儒，墨子代表游士中的侠；孔子代表士人的未来，墨子代表士人的过去；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士人失败的代表。

孔子和墨子的相同点：

他们代表的儒和侠都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底线。因此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满，也都要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出治疗的药方，正是由于开出的药方不同，才引发了儒墨之争。

## 月影之域：大爱无言说墨子

古人说，最大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声音，最大形体是看不见的形体。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玄妙，但用在爱上就好把握了，最至高的爱是无言的。从古自今，“爱”或许是我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他被人们永远的追寻，被人们虔诚的崇拜……，爱是至言，爱是真理，只有在无遮盖，无保留，无算计，方可言爱，因为寻找到了爱就寻找到了幸福。他就是在说着“爱”走来，又说着“爱”引领着大家向前走去。现在我们靠近墨子，走向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思想，倾听他沉潜舒缓地低诉，我们必将获得生命中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

墨子名翟，鲁国人，和孔子是老乡，曾为孔门弟子，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不过，从他师从孔门这个事上，可以约略的推出他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即春秋与战国的过度时期。墨子虽然曾师儒门，却是从“非儒”起家的，进而自立门户独创墨学。如果从封建礼教的角度来说，他这是背叛师门，犯下的罪过如同臣子叛国儿子弃父，是可以杀头的。不过，幸好的是，在那个时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繁缛礼教还没有形成系统，用于整个国家的统治，不然，他的小命或许是要不保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将失去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思想巨子，失去一个大爱无言的圣贤。

说他是思想巨子，是因为他自己开山立派，创立了墨家学说；说他是大爱无言的圣贤，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站在下层体力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说他入乎其内，是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乎其外，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他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并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

墨子出身贫寒，他身知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即使有了名气，也没有因为人们看重他而让自己的生活改观，为自己捞些好处。他始终都和学生们一起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勤劳动，以吃苦为乐事，并自称“贱人”。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民族精神。不过，用现在人的一些观点看来，似乎他活的有点太不“潇洒”了，而正是这种不潇洒却让他保持了生命永恒的辉煌，也正是这种不潇洒却倡导出了一个民族优秀的品质——兼爱。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平等，强大的不要欺侮弱小的，聪明的不要欺侮愚笨的，富裕的不要欺侮贫困的。在诸侯兼并、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对于他们来说，生的希望是渺茫的，只有死才是经常光顾的，而弱小

的诸侯国家则是强大的诸侯国家的口中之物，朝不保夕。墨子倡导的“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为了阻止“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使弱小的诸侯国能摆脱灭亡的命运，使受欺压凌辱的人民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出于这样为贫弱者代言的动机，墨子的“兼爱”学说总是着眼于实际的利益，让每个人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目的（《非命下》）。他说：“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非攻下》）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很显然，他的这些道理，都是真正从贫困的民众和弱小的诸侯国家利益出发的。不论是君臣也好，父子也罢，让他们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相亲相爱。这和孔子等级森严的以血亲为宗法本位为核心的“仁爱”学说相比，是更加人性化的。

墨子一生做过许多事，不过，我们详细知道一点的就是他的“非儒”和“止楚攻宋”这两件。拿“非儒”来说，一个儒门弟子，由“学儒”到“非儒”，颇是有些耐人寻味的。这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怀疑的精神，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墨子对儒家的不满，首先是礼仪制度的繁复。儒家的礼仪制度，制约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钳制了人的思想，束缚了人的手脚，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不难看出这种

礼教的危害，从墨子的对它首先（儒家礼教）的发难，到五四运动的大规模“清算”，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千多年。其次是厚葬重孝的危害。棺木要多层，葬埋要深厚，随葬要繁富，坟墓要高大，这对于那些王公贵族来说是一次炫耀财富和权势的机会，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生活的大地震。当我们在古墓里，看到一具具殉葬的幼儿骸骨时，我们又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呢？《公输》中“止楚攻宋”的故事，这也是墨子实践“兼爱”思想中一个经典的案例，墨子听说楚国将攻打宋国，从鲁国出发，只身赴险，行十日十夜赶到楚国，先以道理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又与公输盘进行攻、防演习，尽数挫败公输盘的各种器械，公输盘的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器械还有赢余。公输盘何许人也？是被后人奉为制造始祖的鲁班先生。因此，楚王只好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

单纯的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圈圈里打转的人，无论其思想认识有多么深刻，在思想史上地位有多高，都会因为其它知识的缺乏，而造成性格上的营养不良。不过，在墨子身上，我们看不到一般知识分子身上的酸腐气、迂腐气和狂傲气。或许你不会相信，墨子还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匠人，顷刻之间，削三寸之木，能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的车轴；他研制的木鸢，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令人们啧啧赞叹，墨子还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军事战略家，墨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就

在于它有着更加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纪律要求，弟子们平日里学习谈辩、说书、从事三科，战时则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像他那样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建树和熟练的手工技艺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用现代人话说，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和科学家于一体的全能型人才。所谓全能，也就是一专多能。既有切如生活、认识社会、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也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给社会以深刻广泛的影响，又能亲身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洞悉自然的道理和宇宙的变迁。墨子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打上了深深的下层劳动者的印记，同时也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智能结构和人格魅力。墨子的这些表现，无论作为思想境界，还是作为一种风范，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树一帜。

《墨子》一书同其他“子书”一样，大部分是墨子言行的忠实记录。此书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尽的有十五卷五十三篇。墨子的文章不像庄子那样汪洋恣肆，也不似孔子那般说教，以卫道者自居。我们在读《墨子》的时候，不要想望从他那里获得什么警句和格言，他更多的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墨子写文章和他做人一样朴实无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楚王问墨家弟子田鸠说：“墨子是著名学派的领袖，他

努力实践自己的学说主张是影响非常大，可是他的言论却无文采，这是为什么？田鸠于是给楚王“秦伯嫁女”和“楚人珠”两则寓言之后说：“墨翟的言论，是宣传先王之道，论述圣人之言，要把他们明白的告诉人们，假如巧饰其辞，人们就会留意于他的文辞，而忘掉思想上的作用。不过，从写作理论上来说，墨子的观点不能说没有偏颇，华而不实固然要不得，但必要的艺术形式却可以使文章富有感染力。墨子文风的纯朴，实在是其处世原则的又一种表现，像他那样一个克己实用的人，不可能设想他在文章里会追求华丽的辞藻、浪漫的情调和绮靡的文风。故孙诒让说他“质而不华，务申其意，而不驰骋其辞。”（《墨子间诂》）

有一次，墨子从路过去齐国探望一个老朋友，老喷够见面后就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谁在行义，你偏偏自己受苦去行义，何苦呢？”墨子抬头看了看天，回答说：“有一个人，他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耕种，九个闲着，那么从事耕种的那一个儿子不能不加紧干活。什么缘故呢？就是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的人没有谁不在行义，呢么你应该鼓励我行义呀，为什么阻止我呢？”如果把他的话拿到现在来看，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这样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华丽且浮躁的氛围里，很多人把有多少钱，看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时代总是或多或少有它的缺



陷，总是将某一点推向极端的同时把其它仍到脑后，看清楚了一点，我们不妨学学墨子，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中华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一种人伦文化，始终认为“劳心”者为上，“劳力”者为下，对自然科学很少关注，甚至鄙视那些关注自然科学的行为。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道理，又总是站在弱小的一方说话，所以统治者惧怕他、嫉恨他，甚至诋毁他，他的这种平民意识，终于在封建大一统的历史飓风中，变的“大音稀声”了。

物质之门紧闭着，精神之门敞开着。此刻，街灯朦胧，我仿佛看到你的背影若不系之舟，漂泊于悠悠岁月，当风拂过，一切早已是那么的清晰。

**弘·毅** 发表于：2005-11-26 14:07:30

遗失的传统：墨子

作者：林苞

先秦的时候，墨家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孟子曾经感叹“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并且以“口距杨墨”自任。到了韩非子著《显学》的时候，他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当染篇》则把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但是，等到司马迁写《史

记》的时候，居然无法为墨子作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了一段小文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记述。汉朝早期的时候，墨子仍然被视为智慧的代表，与孔子并称，比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说：“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子似乎就从思想界消失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二千年间，只有韩愈等一两个人曾经说过同情墨子的话，至于注解的人就只有晋朝的鲁胜一人。

这种现象难道不是非常特别吗？譬如大地上原来有两条河流，几百年后，其中一条干涸了，人们只习惯到剩下的那一条去取水，于是，他们说：天下的水都必须从这条河中去取。假如墨子的思想是无益的，那么，它的衰微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假如这条河流的水是不可饮用的、无法通行的，那么它被堵塞，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叹。但是，如果它的断绝只是由于人们的疏忽、无知与偏见，那么，当人们发现它的遗迹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历史并不是成王败寇的舞台，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古希腊雕塑的碎片，其价值要远高于教堂的闪闪发光的镶玻璃。今天，当人们去审视墨子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时，不免会有同样的感慨。

一辈子饮用黄河水的人，他们也许会说：中国的水是浊的，

他们也许会觉得饮浊水就是他们的命。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源头，就会说：这不过是历史的成迹，并不是必然性。对于中国文化，人们观其成迹，已经发过许多议论，但是，那些想要把那些特点作为中国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们了解更多早期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过于武断。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来揭示这一类谬误。

### 述而且作

保守性是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这种特性的源头，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墨子早就明确反对这种态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不君子”者的一种。在《耕柱》篇中，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说“知止不殆”，《大学》中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但是墨子告诉我们“善”是可以“益多”的，这是中国最早的“进步主义”。

### 方法的自觉

论述的直觉性、辩论的独断，也是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就以孟子攻击墨子的话作为例子，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句话作为他的感情的表达则可，作为分析则不可，因为他实际上是故意扭曲了墨子的主张，并以此作进一步的夸张。后来，这种道德化的独断方法竟成为中国人辩论的一个习

惯。反过来看墨子，他对待儒家的态度则是分析的，在《公孟》一篇中他说儒有“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程子觉得他过于严厉，他说：“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他对孔子也是分析的，他曾经引用孔子，别人问他为什么非儒而又引用孔子的话，他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重视分析的态度是中国后来缺乏的，儒、道讲道理，多是启发性、论断性的，所以，《论语》里面很多概念的含义研究了几千年至今都不清楚。这样的传授方法永远都必须要有权威，必须依靠权威来解释，这种方法是扼杀学生的独立性的，只有你把自己变成权威之后你才有独立性。人们常说中国人缺乏个性，也许根本上就是这个文化后来的传授造成的，因为在那里方法是隐藏的、随意的、无法明白地告诉学生的。但是，墨子则不然，他为研究问题确立了“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本”是历史，“原”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用”就是付诸实施以观察后果。《墨子》一书中“三表”的应用比比皆是，对许多问题都是按这些原则去分析的。“三表”的确立和运用本身是一大贡献，但是，更伟大的贡献是意识到必须为研究问题确立方法，因为只有有了方法的自觉，才可能有研究的活动。后来在中国的学术中真正可以说是研究的，其实微乎其微。墨子还提出“察类”与“明故”的原则，“察类”就是概念的明确性，

“明故”就是因果性，通过探寻概念的含义和因果性来研究问题，这不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吗？这一类问答在《墨子》一书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的思想光芒。

## 逻辑与实验

爱因斯坦曾经推测科学是很难在中国产生的，因为科学依靠“逻辑与实验”，而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是，如果他了解墨子的思想，他的说法就会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已经具备相当全面的“逻辑与实验”的思想。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其中不但已经有纯科学(比如试图对数学的基本概念“平、中、厚、圆、方”进行定义、试图对时空结构进行定义)，而且已经对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探讨(诸如对充分、必要、充要条件的研究，对辩论、推理方法的研究)。这几篇文章也许在完备性上还是比一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逊色，但是就它们在思想中引入了这种自觉性而言，它们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伟大的，如果考虑到由于长期的忽视，这一部分内容肯定有散失和模糊，这种评价就更有根据了。观察与实验也已经被有意识地进行，诸如在光学、力学上的成就，墨子本人不但以“巧匠”闻名，在他的书中还留下了机械设备的发明。在这一切之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墨子把这部分内容作为他教授学生的重要内容。因此，正如李绍崑

先生说的“(墨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发明家，而且即使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之一”。而这一传统的衰微直至长期断绝，的确是中国科学史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墨子思想中最伟大的部分，还没有谈到他的“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还没有谈到他对宿命论的猛烈攻击，还没有谈到他“急义”、“苦行”的伟大人格。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的社会，他认为父母、老师、君主都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因此，他要讲“天志”、“明鬼”，但正象詹剑峰先生说的“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此岸的，不是彼岸的”。从墨子开始讲学的时候起，就有人攻击他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人格。《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格之一。

梁启超先生对二十世纪重新重视、研究墨子贡献很大，他在《墨子之论理学》中说：“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这使他非常感慨。历史如果是由思想的辩论来决定的话，那么墨子必定不逊于孔子，

墨学在中国历史上一度长期断绝一定是理论之外的原因。探究这种原因，或者去探究历史的可能，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认识这一遗失的传统是认识我们的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环，历史即是我们的集体自我意识，我们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独断论的方法了。注：对于《墨子》一书的著作情况尚有争论，本文基本上采用詹剑峰的说法，把《墨经》视为墨子自己的作品，而把《十论》视为墨家学者所记录。

参考书：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墨子译注》，辛志凤、蒋玉斌等，200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墨子的哲学与科学》，詹剑峰，1981，人民出版社

《墨子：伟大的教育家》，(美)李绍崑著，张志怡译，198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墨子与中国文化》，张永义，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宪政青年** 发表于：2005-11-26 18:01:03

第 2 楼

墨学的沦丧诚为中国之大不幸。祸因可能就在